

第三篇

进口贸易

1821年已有鸦片由英属印度经云南辗转输入四川。鸦片战争(1840年)后,逐渐有外国商品转入四川市场。1876年,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宜昌地处入川的咽喉重地,洋货入川从宜昌中转比过去提前30天,从而洋货进入四川迅速增长。

1890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敞开。当年,四川进口总值增长为481万关两,比上年增长76.8%。嗣后,英、法、德、日、美等国陆续在重庆、万县、成都开设洋行,四川进口总值逐年上升,至1911年的22年间平均年进口总值为1033万关两。其间1899年首次突破千万关两达1307万关两,1903年,为最高点达1807万关两。

辛亥革命后,四川人民掀起了几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洋货受到抵制。1912~1931年的20年间四川

年均进口总值为1163万关两,只比1890~1911年期间的年均进口总值增长12.5%。其中,1918年为最低年只有570万关两,1929年为最高年达1722万关两,也只接近1903年的水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淞沪战争后,四川进口开始下降。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进口继续下降。1938年国民政府宣布对日贸易禁令。翌年宣布对奢侈品半奢侈品进口禁令。当年,四川进口总值为105万元。1940年,国民政府为缓解工业用品的奇缺,减少禁运商品,当年四川进口总值增至480万元。1941年由于对煤油等液体燃料、大米、牲口、载重汽车、奎宁药等战时必需品进口进行免、减税,当年进口总值增至910万元,比上年增长近1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对外交通运输更加困难,四

川进口贸易又急剧下降,1944年为288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川进口开始复苏。1946年为88070万元(没有剔除货币贬值因素)。同年,国民政府颁布了《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外汇管制暂行办法》,将进口商品分为“禁止”、“许可”和“自由”三大类,规定进出口外汇审批结汇制度。同年11月重新修订,废除“自由”进口类,实行全面“许可证”和进口限额制。但进口商品仍然充斥市场。由于1946年1月,海关税务总司署迁回上海,四川进出口货物又多在沿海口岸报关,因此1947~1949年四川进出口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对外贸易统制政策,进口贸易由国家统一安排。国家根据出口创汇的可能,分别轻重缓急,以“保证重点,补助一般”的原则,统筹进口后分配各省(市)。同时也采用地方外汇或出口留成外汇等形式给各省(市)分配少量外汇,由各省(市)自行掌握使用,作为国家物资分配(包括进口物资)不足之“打补丁”。本篇所记述的主要是后者即四川自行掌握的地方外汇和1981年以来省有关部门的调剂外汇的进口贸易。国家统一进口分配给四川的物资和建设项目只在个别地方作些简略的叙述。

1950~1954年,四川地方进口工作由省各工商业部门按省计委分配的

外汇额度自行委托外贸专业总公司办理。1955年后,由省物资供应局统一办理。1953~1957年,四川进口总值为266万美元,1958年为2987万卢布。

1959年,四川省人委决定四川进口工作由省对外贸易局统一办理,省对外贸易局成立了进出口科承办进口工作。但具体手续,由于四川没有进口自营权,仍由省提出进口货单,按国家规定的进口商品分级管理原则,送由外贸专业总公司或口岸公司向外订货。1959~1962年,四川地方外汇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物资总额为4564万卢布,年均1141万卢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总额为1116.6万美元,年均279万美元。进口增幅较大,用汇来源主要是1958年、1959年中央分给四川的地方外汇、出口留成外汇和1959年、1960年四川省计划外专项出口大米1亿斤和5亿斤(含杂粮)的外汇。

1960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为还苏联债务,国家对进口采取严格控制,减少了对地方的外汇分配,进口订单下降,1962年为17万美元,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的最低年。1963~1965年进口到货金额433万美元,年均约144.33万美元。

1966年后,四川地方外汇逐年有所增加,1976年突破千万美元达1050万美元。1966~1976年,四川进口到

货总值为 7254 万美元, 年均为 659.4 万美元。1977~1978 年进口到货总值为 3758 万美元, 年均为 1879 万美元, 比上期年均又增加 1.8 倍。

1979 年, 四川省接办自营进口业务, 除国家规定由外贸专业总公司统一经营进口的商品外, 其余商品四川均可直接对外进货。四川进口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1979~1987 年, 四川进口到货总值为 88409 万美元, 年均为 9823.2 万美元。贸易方式由单一委托发展到代理、自营、联营等多种方式, 外贸进口企业由一家发展到多家, 各外贸进出口公司都可以开展进口业务。进口物资由单个商品发展到生产线、成套设备和技术引进。

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 鸦片战争前, 四川进口商品主要是南药、宝石、翡翠、象牙等特产。进口市场主要是缅甸、印度、东南亚以及欧、非洲等国家。

鸦片战争后, 中国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地, 进口以消费资料为主。四川主要进口商品是棉纱、棉布、煤油、染料、颜料、铁钉、铁丝等。随着资本主义向中国加紧推销商品, 四川进口的品种和数量也不断增加, 主要是奢侈品, 洋药、洋烟、洋酒、洋水果、洋香水、洋肥皂、洋火柴等等, 逐年增长。而机器及生产工具的进口则很少。1932~1934 年期间, 四川进口商品的比重是: 棉纱

占 66%, 棉布占 8.6%, 洋烟占 6%, 煤油占 2.2%, 其它消费品、奢侈品占 15%, 五金机器只占 2.2%。鸦片战争后, 四川洋货主要来自英国。甲午战争后, 日、美两国洋货不断增长, 直至抗日战争前, 四川市场是英、美、日、法、德等国竞争的场所。主要进口的商品: 棉纱、棉布多来自香港; 海产鱼介类多来自香港、日本; 毛织品多来自英国、法国、日本; 五金机器多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香港货在 1894 年前多是英国商品, 嗣后, 美国、日本商品通过香港转口的也逐渐增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 四川正常的进口(不包括战时军火), 主要是日用消费品, 其次是纸张、机器工具和五金产品, 再次是车辆轮胎等, 其中, 棉纱、布匹、化学用品、染料、药品等日用消费品占进口总值的 50%~70% 以上。在抗日战争时期, 美国货不仅直接输入四川, 而且还经由香港、印度及东南亚等国转口输入四川。从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进口也迅速增长。自 1940 年 9 月国民政府开始放松进口禁令, 不再考虑进口商品的真实原产地以后, 日本便趁机将其本国的、或其属地的、或从沦陷区掠夺来的商品, 大批运往香港, 经改装和换贴标签后转销国民政府统治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 美国几乎独占中国市场, 美国除大量向中国输入一般商品外, 还以“援助”、“救济”和“贷

款”的形式向中国输出庞大的特种物资,享有免税免验的特权,且由国民政府统一承购,故称为特种进口物资。这种特种进口物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倾销。由于大量美货充斥市场,使原本就脆弱的四川民族工业遭到沉重的打击。

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近百来被帝国主义控制的旧中国对外贸易的破产,全面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按照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安排进口所需物资。根据这一基本精神,国家对进口项目的安排,主要原则是:国内已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能满足需要的不进口;尚不能满足需要的,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少进口以至不进口;对需要进口的商品,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补助一般”,“先进急需,后进一般”;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安排上,主要进口生产资料以保证生产建设需要,适当进口生活资料以调剂国内市场;在生产资料的进口中,首先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把进口技术设备放在优先地位,同时适当兼顾一般生产建设的需要。随着各个不同时期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国家对进口重点的掌握也相应进

行一些调整,有时还根据特殊情况作较大的调整。四川地方外汇的进口也是按照上述原则办理。进口的商品是随着省内国民经济发展变化而增减起伏。

1950~1979年,四川省进口商品主要是生产资料,其次是生活必需品。主要品种有:钢材、农药、载重汽车、工业用轴承、电工器材、仪器仪表、化工原料、橡胶、药材、医疗器械等。1966~1977年期间统计,进口商品使用外汇的比重是:钢材居首位,占48%;其次是机电仪产品(主要含工业用轴承、载重汽车、电工器材等)占27%;再次是化工产品,占20%;其它5%。进口国别和地区,50年代,主要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50年代后,主要是日本和香港地区,其次顺序为原联邦德国、美国、意大利、瑞士和英国等。

1980年后,四川进口从单一商品向成套设备和引进技术转变,除使用地方外汇外,加快了利用外资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技术的工作。

1953~1987年,四川进口到货总值累计为4564万卢布和101237万美元。其中1979~1987年的9年,进口到货总值达88409万美元,占87.3%,均为9823.1万美元。

第一章 金属材料

第一节 黑色金属

1891~1911年间,累计进口五金矿石 89544 担(折 4477.2 公吨),金额 1635494 关两,年均进口 213.2 公吨。其中钢材(铁条、铁钉、铁丝、铁管、马口铁及其它金属制品)约占 92%;矿石占 8%。其间,1906 年为最高年,达 32431 担,金额 747833 关两。

1922~1931 年,黑色金属进口仍保持年均 34359 担,金额 254406 关两,品种仍然是铁条、铁板、铁钉、铁管、铁丝、钢板、马口铁、竹节钢等。1932 年日本在上海挑起的淞沪战争后,黑色金属进口开始逐年减少。1932~1935 年,累计进口 6.68 万担,年均仅 1.67 万担。抗日战争爆发后,黑色金属进口继续下降,1939 年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最多一年,也仅为 0.5 万担。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取代英、日等国独占四川的钢材市场,美国钢材平均每吨售价 13 万元,国产钢材平均

每吨则高达 80 万元,因而美货泛滥,严重打击了四川的钢铁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黑色金属仍是进口的主要商品之一。在 50 年代,钢材被西方国家列为对中国“禁运”的物资。1953~1957 年,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钢材用汇 460 万卢布,从资本主义市场进口钢材用汇 152 万美元。1959~1962 年,由于经济建设对钢材需要量大,但地方外汇有限,使用计划外出口大米中的部分外汇,累计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钢材 657.8 吨,用汇 136.3 万卢布,从资本主义市场进口钢材 36084.4 吨,用汇 515.4 万美元。

60 年代前半期,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进出口贸易有所紧缩,钢材进口量 1963~1964 年连续处于低水平,累计进口 3667.5 吨,其中,1964 年是最低点,仅 5.5 吨。

1965年开始,随着省内经济建设的需要,钢材进口量又逐年大幅度上升,1965年进口3502吨,1967年增至12748吨,主要是用于生产电机和变压器,品种主要是热扎钢板、矽钢片等。1967~1976年间进口黑色金属的用汇3426万美元,占同期进口用汇总额7254万美元的47.2%,居首位,主要是进口特种钢材、优质钢材和省内短缺的急需钢材。其中,1968~1970年,钢材进口量有所起伏,年均进口8069吨,主要用于制造机械设备和地方小化肥厂。主要品种是优质钢材、管材和板材,占总量的98%。

进入70年代,钢材进口又逐年增长。1971年进口20993吨,比1970年进口8633吨增长143%。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从此钢材进口

主要来自日本。1971~1979年共进口钢材174650吨,年均为19406吨,其中,1979年为最高点达25657吨,1975年是最低点为11178吨。

在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国家压缩基本建设,钢材进口量有所下降,1980年进口11328吨,比1979年15165吨下降25.3%。1983年下降至7910吨。1983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后,钢材进口量从1984年又再度上升,当年进口18652吨,比上年增长1.3倍,1987年增长至44299吨。主要是盘元、螺纹钢、工具钢、角钢等建筑用材和薄钢板、矽钢片、马口铁等。

1953~1987年累计进口钢材452094吨。

四川钢材进口表

表3-1

1959~1987年

单位:吨

年 度	进 口 量	年 度	进 口 量	年 度	进 口 量
1959~1962	36742	1971	20993	1980	11328
1963	160	1972	19196	1981	2589
1964	6	1973	19005	1982	8330
1965	3502	1974	25554	1983	7910
1966	7470	1975	11178	1984	18652
1967	12748	1976	15878	1985	58337
1968	3105	1977	25657	1986	41165
1969	12468	1978	22024	1987	44299
1970	8633	1979	15165	/	/

第二节 有色金属

1922~1931年的10年间,四川进口铜金属44215担,金额1198503关两,镍金属944担,金额72712关两,锡金属9325担,金额744817关两,锌金属1412担,金额26404关两,铝金属1担,金额68关两。1932~1936年期间重庆海关只记载五金矿石进口6812担,而没有区分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有色金属进口量有所减少,1939年进口铝锭1446担,铜金属2400担。1940~1949年未见有色金属进口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省内经济建设的需求不断增加,有色金属的进口量也逐步增长。进口的主要品种是:铝、铜、锌、镁等。

1958~1962年,四川地方五小工业——小冶金、小化肥、小煤窑、小水电、小水泥厂发展较快,有色金属需求量增加。这五年累计进口有色金属142.4吨,年均35.6吨。其中:紫铜管、板和磷铜丝(导电用器材)110吨,居首位;其次是镍和镍材(用于冶炼合金钢,电镀等方面),再次是镁锭(用于冶炼镁合金、化学工业等方面),以及少量的铋(用于制造安全栓、保险丝等方面)、镉(用于原子能工业方面)、钽

(用于航空工业方面)等。

1963~1965年,地方外汇紧缺,有色金属进口量减少。三年累计进口14.52吨,年均4.84吨,比上期减少86%。主要品种是:紫铜管、镍管、镍板、无缝镍管、锌皮、锌片等。主要用于轻工、化工等行业。

1966~1970年,随着四川“三线”建设加快,有色金属进口增长,五年累计进口412.9吨,年均82.58吨。其中,1969年为最高年达395吨,占96%。主要品种是:紫铜板、电解铜、铝锭、镍铬、镍管、镍板、无缝镍管、锌皮等。其中:铝和铝材为200.5吨,居首位(主要用于电线、电缆、航空、汽车工业方面),其次是电解铜、紫铜板和其它铜板173.2吨(用于电工器材、电镀加工等方面),再次是镍棒、镍管和其它镍材31.2吨(用于冶炼不锈钢、电镀、化工仪器仪表制造方面),锌皮8吨(用于制造白铁皮、电镀、干电池、印刷锌板方面)。1970年后,国内锌的产量增加,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从而停止锌的进口。

1971~1980年,国内铝的年生产增长率长期小于消费增长率,进口量增大,这10年累计进口有色金属7457.5吨。其中主要是铝锭和铝材达

5538 吨,其次是电解铜和紫铜为 1919.5 吨。对缓解省内铝和铜的需求起了一些作用。

1981~1984 年,国际市场金属材料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大,电解铜涨价 68%,铝锭涨价 58%。因此 1981~1985 年有色金属进口量下降,但省内铜和铝的需求量大,因而集中进口铜和铝。1985 年进口紫铜板、丝达 1004 吨,创历史最高峰。进口铝 1100 吨。此外,1984 年进口钴 7 吨(用于医疗、冶炼方面)。

1986~1987 年,进口紫铜和紫铜丝 402 吨,进口钴 34 吨,有色金属压延材料 3 吨和制品 9 万美元。

有色金属进口的主要来源:铜和铜材为英国、日本、智利、赞比亚等国家,分别占 47%、24%、20%、7%,共占 98%。铝和铝材为英国、法国、加拿

大、也门、原联邦德国、南斯拉夫、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分别占 16%、16%、12%、11%、9%、8%、7%、3%,共占 82%。镍和镍材为原联邦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家,分别占 65%、12%、8%,共占 85%。锌片分别从日本、原联邦德国两个国家进口。钴从香港地区进口。

1959~1987 年,累计共进口有色金属 10177 吨,用汇 1154.55 万美元。其中,主要品种铝和铝材 4583 吨,用汇 539.3 万美元,占 46.7%;铜和铜材 3602 吨,用汇 539.1 万美元,占 46.6%;镍和镍材 49.7 吨,用汇 24.9 万美元,占 2.2%;稀有和贵重金属(钴、铋、钛等)17.8 吨,用汇 26.8 万美元,占 2.4%;镁、钨丝、磷、锌皮、压延材料共 70 吨,用汇 24.4 万美元,占 2.1%。

第二章 机电仪产品、技术和成套设备

第一节 各种车辆和零配件

各种车辆是四川机械产品进口的一个重要品种,其中主要是载重汽车,进口始于1925年。1925~1928年,累计进口88辆,金额5.71万关两。成渝公路逐段通车后,汽车进口有所增加。1929~1931年进口509辆,金额71.89万关两。另有自行车1962辆,金额4.81万关两。

新中国成立后,汽车进口量有所增加。1959~1962年,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1372辆,用汇1335万卢布;从香港地区进口25辆,用汇3.99万美元。汽车零配件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92.5万卢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6.5万美元。

1963~1965年,进出口贸易缩小,车辆进口锐减,仅在1964年进口汽车5辆,其余各年均无进口,汽车零配件进口稍多,也只有4.8万美元。

1966~1975年累计进口汽车

1101辆,含从原联邦德国进口的45吨平板拖车1辆。这一时期,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的汽车只占5%,而从日本进口的占93%,原联邦德国等占2%。同时进口一部分汽车零配件,金额为111.5万美元。从此,汽车进口由原来的原苏联为主转向以日本为主。

1976~1987年,为了适应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进口汽车骤增,累计进口达4433辆。其中载重汽车约占37%,比重有所下降,其余是旅行车、工具车、越野车、小轿车等车辆的进口数量增加,约共占63%。汽车零配件进口也随之增加,共计用汇2348.9万美元。这时期进口车辆仍然主要来自日本。

为了提高日本车辆的维修质量,1982年10月,省外贸进口公司邀请日本住友商社崛原二等4人来成都商

谈马自达汽车维修服务事项。1985年5月,建立马自达汽车成都维修站,对外事务由省外贸进口公司办理,维修业务由省粮食汽车大修厂承担,维修站有一座950平方米的汽车维修房。1986年10月,建立丰田汽车成都维修站,对外事务由省外贸进口公司办理,维修业务由东方红小汽车修理厂承担,维修站有3幢1424平方米的厂房和附属建筑。

1959~1987年期间共进口各种车辆6936辆,其中载重汽车约占40%,小轿车、旅行车、越野车、工具车、摩托车等约占60%。用汇金额为1958万卢布和3685万美元;各种车辆零配件用汇金额92.5万卢布和

2471.7万美元。

进口车辆曾发生两起外商履行合同的违约事件。一是,1980年省外贸进口公司向日本住友商社订购800辆“马自达”工具车,货到后发现3辆工具车的大梁有裂纹,省外贸进口公司提出索赔,日方赔偿10辆“马自达”工具车的大梁结案。二是,1984年,四川省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委托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与日本东京贸易株式会社签订250辆丰田越野车的进口合同,由省外贸进口公司执行。日方没有完全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省外贸进口公司提出索赔,日方赔偿1334万日元结案。

四川汽车进口表

表 3-2

(1959~1987年)

单位:辆

年度	进口量	年度	进口量	年度	进口量
1959~1962	1397	1971	/	1980	1240
1963	/	1972	300	1981	102
1964	5	1973	471	1982	/
1965	/	1974	80	1983	/
1966	13	1975	236	1984	403
1967	1	1976	40	1985	1857
1968	/	1977	6	1986	227
1969	/	1978	110	1987	16
1970	/	1979	432	/	/

第二节 机 床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对机床的进口在50、60年代以普通机床为主,到70、80年代,自动化、现代化的大型精密机床的进口逐渐增长并成为机床进口的主要品种。

1959~1966年累计进口机床46台,其中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43台,占93%,用汇218万卢布;从原联邦德国、英国、瑞士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3台,占7%,用汇4万美元。进口品种是车床、磨床和镗床。1963~1966年没有进口。

1967~1970年共进口机床196台,为1959~1966年的4.3倍。其中1969年为148台。进口国别主要是瑞士、日本、原联邦德国、意大利、英国、瑞典等国家。进口品种主要是高精度的磨床、铣床、镗床、钻床、刨床等。

1971~1975年,累计进口机床62台,比“三五”计划时期减少69%。用汇112.4万美元。进口国别主要是日本、原联邦德国、瑞士、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家。进口品种主要是双臂龙门刨床、卧式镗床、冲球床、铣床和钻床等。

1976~1980年,机床进口量减

少。这一时期仅进口9台,用汇21.16万美元。另进口机床零配件用汇47.5万美元。进口国别主要是瑞士。进口品种主要是磨床和铣床。

1981~1987年,由于省内不少工厂需要进行技术改造,机床进口数量有所增加。共进口186台,其中1982年最多,达60台。1984年最少,只进口4台。

1959~1987年期间,累计进口机床499台,用汇224.7万卢布和939.5万美元,进口机床零件107.5万美元,对四川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比较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特别在钟表工业上体现尤为显著。四川钟表工业在50、60年代还很落后。重庆钟表工业公司是四川生产手表的基地。70年代开始试制手表,至1975年仅生产4000多只。1976~1985年,重庆钟表工业公司陆续进口瑞士专用机床和表壳生产线等设备共550台,选派技术人员去瑞士学习技术。产量不断增加,质量日益提高。

第三节 发电设备和动力机械

一、发电机组

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发电机组主要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60年代后期转向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1957年,从罗马尼亚进口3000千瓦电站设备一套。1959~1962年,从保加利亚进口1560千瓦水电站设备一套,用汇69.77万卢布;从原苏联进口柴油发电机组61台,共计3630千瓦,用汇196万卢布,1500千瓦蒸汽透平机组2部,用汇142.73万卢布;从原捷克斯洛伐克进口6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4台,用汇6.77万卢布;从原民主德国进口柴油发电机组17台,共计2766千瓦,用汇86.4万卢布,1500千瓦火力发电设备1套,用汇170万卢布;从香港地区进口柴油发电机组1台,用汇3000美元。

1965年,从日本富士电机公司进口2500千瓦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一套,用汇47.05万美元。合同规定1968年交货,由买方自行安装调试,用户是四川省水电厅。这种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的特点是可以利用落差小的河流安装发电,当时国际上只有法国、日本等少数国家生产。中国是首次引进。因此水电部也极为关注。这台

机组是由省对外贸易局委托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办理。该公司邀请日本富士电机公司和日绵、明和商社的代表和四川省对外贸易局、省水电厅代表在北京谈判签约。当时日本富士电机公司营业不景气,因此争取到优惠价成交。1968年到货后进行严格验收,发现导叶上有凹陷,三根行星齿轮轴上有伤痕,发电机转子内有一隐患性铁屑。经重庆商品检验局出证后,通过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向日本富士电机公司提出索赔。日方派出专家和商社代表来北京处理,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交通极为困难,为不影响索赔的谈判,将重达2.8吨的发电机组部件空运北京,双方达成协议,导叶上的凹陷由中方修复,日方赔偿14500英镑修理费;三根行星齿轮运回日方修理。

这套发电机组安装在射洪县金华镇东风电站,于1971年10月投产运行。

二、电线电缆(含电工器材)

进口的电线电缆主要供应电讯、电力部门使用。1959~1965年,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电线电缆128万卢布。其中从罗马尼亚进口橡皮绝

缘铝线 2500 公里,用汇 35.02 万卢布;从匈牙利进口钢芯铝绞线 20 吨,用汇 4.88 万卢布;从原民主德国进口钢芯铝绞线 85 吨,用汇 19.97 万卢布,漆包线 10 吨,用汇 5 万卢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电线电缆 8.13 万美元。进口国别主要是比利时、芬兰、法国、瑞士、荷兰、意大利、英国等。进口品种主要是钢芯铝绞线、裸铝丝等。

1966~1976 年累计进口电线 1820 吨,电缆 315 万公里,用汇共计 216.11 万美元,年均进口用汇 21.61 万美元。其中 1969 年用汇最多,达 99.67 万美元。1974~1976 年没有进口。

1977~1987 年,累计进口用汇 53.7 万美元,年均进口用汇 5.37 万美元,比上期年均减少 75.2%。其中,1977 年用汇 16.2 万美元为最高,1981、1986、1987 年分别为 4.9 万美元、4 万美元、28.6 万美元。其余各年

均无进口。进口国别主要是日本。

三、柴油机和电动机

(一)柴油机

1959~1964 年,累计进口柴油机 417 台。其中 1959~1962 年,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 408 台,从香港地区进口 1 台,1964 年从原联邦德国和英国各进口 3 台。1965 年后,四川柴油机生产能力逐步提高,从此,停止了进口。

(二)电动机

1959~1968 年累计共进口电动机 1051 台,用汇 82.27 万卢布和 2400 美元。其中 1959~1961 年进口 1046 台,占进口总数的 99.5%,1965 年和 1968 年分别进口 1 台和 4 台。1969 年,中断进口。进口国别主要是原苏联、原联邦德国、保加利亚和芬兰、日本等国家。

第四节 仪器仪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仪器仪表的进口数量很少,品种也比较简单。1959~1961 年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用汇 236 万卢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用汇 28 万美元。进口品种有:示波器、光谱仪、显微镜、电动计算机、经纬仪、分光光度计、色谱仪等,其中经纬仪和

显微镜的进口量最大。

60 年代上半期,四川仪器仪表进口有了较大的变动。1962 年仪器仪表进口大幅度下降,仅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 9606 美元。但 1965 年的进口额又大幅度的上升,达到 68 万美元。进口国别和地区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原

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的比重逐步下降,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比重不断增加。

1966~1976年期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仪器仪表进口呈下降趋势。1966年降为25万美元,比1965年下降了35.3%。嗣后,连续下降,1970年下降至7万美元。1971年开始回升,当年进口额为10万美元。1975年继续增长到84万美元。1976年又出现下降,当年进口额为30万美元。

1977年仪器仪表进口又开始回升至49万美元,1980年增至201万美元。进入80年代后,仪器仪表的进口有了新的发展。1983年8月29日至9月3日,在成都举办了国际和香港、澳门地区医疗器械、仪器仪表技术交流会。交流会期间成交期货248万美元,会后留购展品金额为95万美元,占展品总金额的80%。1984年进口额达到1784万美元。进口的仪器仪表也已逐步由机械式向电子化、数字

化方面发展,由低档向高档发展。光学仪器、高倍显微镜、电子仪器、计算器、通讯设备、理化仪器、核子仪器的进口有了较大的发展。1981~1985年仪器仪表进口的结构是:通讯设备占47%,电子仪器占25%,光学仪器占15%,理化仪器占13%。80年代以前电子计算机进口尚属空白,1984年进口额则达501.2万美元。1978年电子仪器进口额仅为8.28万美元,1984年上升至111.7万美元。

1985年仪器仪表的进口上升至2578万美元,1987年又下降为2000万美元,比1985年下降了22.5%。进口国别仍由日本领先,约占进口总量的50%。

1959~1987年,累计从原苏联、东欧国家进口仪器仪表总额为236万卢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10894万美元。主要品种有分光光度计、显微镜、计算机、经纬仪、示波器、光谱仪、色谱仪等。

第五节 技术引进和成套设备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按照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国家安排在四川的项目

主要有重庆电厂、成都电子工厂、四川化工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四川维尼纶厂等。由于技术引进和成套设备进口是由国家计委统筹安排,对外贸易部及所属专业总公司对外谈判签约和

执行合同,项目的实施则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没有列入四川省外贸进口统计。1959~1962年,四川自己利用地方外汇进口发电站2套,3060千瓦,用汇243万卢布。1978年为四川化工厂引进原联邦德国GHH空气透平压缩机组一套,用汇139.5万美元(未列入外贸统计)。这套机组于1980年12月正式投产,运转正常。

1980年,四川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工作至1982年底,累计达112个合同项目,合同金额5763万美元,实际用汇金额1346万美元。1983年,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下降,用汇金额为179万美元。同年年底,四川省政府成立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领导小组。省计经委、外经贸厅、长江企业公司联合召开引进技术工作座谈会,省级有关厅(局)和七个地(市)计经委、外贸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上强调了引进技术对企业改造的重要性,提高了对引进技术的认识。外贸企业也将进口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引进技术上来。1984年,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有所上升,用汇915万美元。1985年4月,四川省政府在成都举办了首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洽谈会。洽谈会偏重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出现了一股引进热潮。洽谈会上对外签订了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达276个合同项目,成交金额累计达13361万美元。由于配套资金

和原料不落实,撤销了部分合同,当年实际用汇为3130万美元。1986年继续上升,用汇金额达到7202万美元,比上年增长1.3倍,比1984年增长6.8倍多。1987年由于四川外汇紧缺,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下降至3546万美元。

1978~1987年,四川使用地方外汇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口成套设备累计用汇金额12593万美元。据省对外经济贸易厅1986年3月在重庆、成都、自贡、乐山、万县等地(市)的10个已投产的引进技术项目进行典型调查,项目涉及电子、一轻、二轻、食品、医药、化工、建材等行业。调查结果:每投资1元人民币,1年可创产值1.81元,税利0.27元,创汇0.08美元;每投资1美元,1年可创产值8.84元人民币,税利1.3元人民币,创汇0.39美元。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一般都达到国际上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效益比较好的项目有:四川化工厂从原联邦德国和比利时引进的年产12000吨三聚氰氨的生产装置,1983年安装投产后成为国内三聚氰氨产量最大的厂家;成都无线电七厂与日本池尻电机株式会社合作,引进录音磁头生产线和专利,1982年4月投产,年产磁头1500万只,返销日本100多万只,质量完全符合要求,受到日本松下、三洋、夏普等专用用户的好评,填补了国内电子行业磁头品种

的空白,成为当时国内唯一能生产双声道、四声道磁头的工厂;1985年国营420厂引进日本夏普家用电冰箱关键设备和生产技术,1987年产量达到100650台;广华涤纶厂引进瑞士伊文达公司年产5000吨涤纶丝全套设备,英国后纺设备,累计用汇1115.3万美元。省外贸进口公司协助工厂筹措外汇,1987年2月正式投产,当年生产涤纶丝2541吨,创利税491万元;内江塑料二厂引进意大利PVC特种玻璃纸生产线和生产技术,用汇89万美元,投产后年产量达800吨,成本低于普通玻璃纸8%,年利润达160万元;乐山长征制药厂引进美国的先进淀粉加工设备,使淀粉收率由58%提高到66%,蛋白质含量由1.5%下降到0.3%,达到药用淀粉的标准,投产3年,共为国家节约进口此项淀粉的外汇451万美元。

四川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一般都能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严格验收,发现质量问题及时提供四川商品检验局的证明,外贸部门向外商办理了索赔,从而维护了国家的利益,确保设备高质量及时建成投产。1985年省供销社沱江果品厂从日本引进甜

橙加工全套设备,用汇73203万日元,按当时汇率为297.1万美元。设备到达厂方发现设备产量不能达到合同规定标准。由于验收工作细致,证据有力,外贸部门向外商提出索赔,由日方赔偿4亿日元结案。当时日元升值约折合300万美元,按美元计算相当于合同成交金额,这是四川对外索赔金额较大的一笔。但也有个别单位,没有按照规定进行验收,事后发现质量问题不能及时提出公正的依据,因而外贸部门无法向外商提出索赔。也有由于外商资信不好,索赔不能得到圆满解决。同时引进工作的计划安排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引进设备不配套。1985年,万县果汁厂引进瑞典80年代先进的可浓缩65度广柑汁的设备,但没有同时考虑灌装线和综合利用,造成产品不易保存,生产能力受到制约,废料不能利用,反而每倒1吨废料需花费14.5元。成都灯泡厂只引进玻壳生产线而没有相应的装配线。(2)重复引进。1984~1985年,各地服装厂争相引进服装生产线,全省共批准引进34条服装生产线,出现了不少问题。(3)用汇和创汇结合不够,创汇型的项目比较少。

第三章 石油、化工和医药保健品

第一节 石油产品

旧中国国内所需石油完全依赖进口,“洋油”长期占领中国市场。新中国成立后,50、60年代,石油供应仍赖进口,由国家统筹安排,统一进口。进入70年代后,中国石油进出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口量日益减少,出口量逐年增加。在整个70年代,石油出口量已大大超过进口量,石油已成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一个主要大宗商品。

1884年,国外石油产品——煤油输入四川,1892年,煤油进口量为20700加仑,金额为1949关两。1891年,美孚油行在重庆南岸建立货栈,储存桶装煤油。1898年英亚细亚油行进入四川,煤油进口量逐年增长。1907年,润滑油开始输入四川,当年进口量为108加仑,金额22关两。由于四川工厂少,销量小,因而进口量增长较慢,1931年为107351加仑,金额

69050关两,进口增长幅度远逊于煤油。1914年,煤油进口量突破100万加仑大关达1190150加仑,1923年上升至9019013加仑,金额达2408181关两。煤油的大量进口,从而在城乡逐步取代了菜油、桐油作为传统的照明物料。柴油在1922年继煤油、润滑油之后进入四川。当年进口量为171吨,金额4471关两。嗣后逐年增长,1925年达3441吨,金额70188关两。1927年急剧下降至15吨,随着川江航运的发展,1928年又回升至5132吨。1929年上升至25079吨。

汽油输入四川较晚,从1930年重庆初建公路以后汽油才逐渐有销路,当时,美孚油行为了乘机扩展汽油销路,特开设一家鸿通油行专销汽油,同时还办了鸿通汽车行来作倡导。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汽油的进口量也日益增长,1937年达到106万加仑。抗

日战争爆发后,长江下游被日寇封锁,石油产品进口量从1938年开始下降,1938年汽油进口量下降至25万加仑,比1937年减少了76%。煤油进口量下降至228万加仑,1939年又下降至4087加仑。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美孚油行的油船美平、美川、美峡均在长江下游的运输途中被日机炸毁,美滩拖轮亦改驶长沙线,故曾有一段时间无油运进。随后改从滇越、滇缅路继续进货,最后则以飞机从印度运油到昆明,再用汽车转运重庆,但进口量有限。1941年,重庆总税务司署对液体燃料实行免税进口。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孚油行曾试图重振重庆业务,但由于当时市场的紊乱,也就暂存观望,仅稀疏运来几批石油产品,以维持现状。1948年后,石油进口逐渐陷于停顿。

在旧中国,四川市场上销售的石油产品,主要来自:美国垄断财团洛克菲勒下属的纽约美孚石油公司、英荷海恩斯壳牌石油公司(也称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和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这三行相互倾轧,争吵激烈。亚细亚火油公司进入重庆略迟于美孚石油公司,美、亚两行在石油销售上进行角逐,美孚约占55%,亚细亚为45%。后来德士古进入重庆,它们又经过一场角逐之后,美孚、亚细亚各占40%,德士古占20%。1932年间,有商人秦圣清向上海华商光华油行(经销苏制石油产品)签订全川经销合同,初次运来

煤油3000箱,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行马上联合起来对俄制石油产品进行排挤,因此,秦圣清经销的俄制石油产品,挣扎了两年便退出四川市场。亚细亚的煤油煤烟较多,不及美孚的油质好,销量少于美孚。亚细亚的壳牌汽油颜色较白,挥发性较高,销量胜于美孚。三行不断竞争,美孚逐渐超过亚细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孚竟形成了独占之势。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四川工农业生产 and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石油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国家分配的石油产品不能满足需求,为了缓解供需矛盾,支援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1959年四川在地方外汇中安排石油产品进口。由于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将石油产品列为“封锁、禁运”物资,只能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当年,从原苏联进口汽车用汽油10348吨,用汇164.5万卢布,从罗马尼亚进口汽车用柴油13500吨,用汇178.34万卢布,润滑油715吨,用汇26.6万卢布。60年代后原苏联大量减少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中国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指引下,开发了大庆油田,摘掉了中国是“贫油国”的帽子,彻底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不仅彻底摆脱了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而且开始有出口。四川从60年代后也未进口汽油、柴油,只是进口少量的润滑油。

1986年,润滑油进口量较大,共计用汇金额为26.2万美元,其中从原联邦德国进口额为22.2万美元,从日本进口额为4万美元。1987年进口用汇下

降至8.5万美元,其中从香港地区进口3.9万美元,日本2.1万美元,美国2.5万美元。

第二节 化工产品

一、化工原料

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的化工原料依赖进口。在抗日战争前,进口的化工原料主要来自日本和德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取代了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基础化工原料的发展比较缓慢,化工原料仍有进口。

1959~1962年,四川化工原料的进口金额为11.70万美元,年均2.93万美元。进口国别和地区主要是原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其次是香港地区和英国、瑞士、挪威、丹麦等国家。

1963~1965年,四川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化工原料进口金额下降至5.03万美元,年均仅1.68万美元。进口国别主要是法国、英国、日本、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家。

1966~1970年累计进口金额为64.64万美元,其中,1968年最高达31.38万美元,1966年无进口。年均12.93万美元,为调整时期年均的7.7倍。进口品种主要是乳香酸、日桔酸、

汀基锡、联苯、聚乙烯醇、环氧脂、苯二甲酸二辛酯、酚酯、二丁脂、二辛脂、树脂、二丁锡、共聚甲醛等。进口国别主要是日本、原联邦德国、英国、荷兰等。

1971~1975年,进口额继续增长,累计达269.27万美元,1975年首次突破100万美元,达109.92万美元。年均53.85万美元,比“三五”计划时期的年均额增长316%。进口品种主要是聚碳酸脂、ABC树脂、共聚甲醛、尼龙、聚氯乙烯树脂、苯二甲酸二辛酯、基甲酸二丁酯、树脂、葵二酸二辛酸、环氧脂、苯二甲酸二异丁脂、葵二酸二辛酯、丙烯树脂等。进口国别主要是日本,约占总额的1/3;其次是原联邦德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荷兰等。

1976~1980年期间,化工原料进口起伏较大,1977年高达440.56万美元,而1979年急剧下降至0.98万美元。1979年9月,国家对外贸易部、财政部通知:进口加工的20种原材料免征关税和工商税,其中含聚丙烯、聚氯乙烯、树脂、ABC树脂。1980年化

工原料进口额又上升至 190 万美元。“五五”计划时期累计进口额为 850.07 万美元,年均为 170.01 万美元,又比“四五”计划时期的年均额增长 215.7%。进口品种主要是苯二甲酸二丁脂、苯二甲酸二辛脂、环氧脂、聚乙烯树脂、癸二酸二辛脂、水醋酸、乙炔黑、聚酯切片、ABC 树脂、乙二醛等。进口国别:日本占 47.6%、原联邦德国占 33.3%、荷兰占 10%、香港地区占 3.1%。

1981~1987 年,由于塑料、涤纶长丝、无纺布化纤的生产迅速发展,广汉涤纶总厂、成都涤纶厂、成都无纺布厂等相继建成投产,化工原料的进口

量继续增长。1983 年,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物资总局、海关总署对聚碳酸脂、ABC 树脂等品种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在这 7 年期间累计进口化工原料达 5071 万美元,其中 1987 年为最高年达 2687 万美元,创历史最高峰。年均进口额为 724.4 万美元,比“五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额增长 45%。进口品种主要是 ABC 树脂、聚苯乙烯、丙烯酸丁脂、甲脂、乙醛、红矾油等。进口国别主要是日本和美国,分别占进口总额的 11.5%和 9.5%,其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西班牙、巴西等国家。

四川化工原料进口表

表 3-3

(1964~1987 年)

单位:吨

年度	进口量	年度	进口量	年度	进口量
1964	27	1972	584	1980	3127
1965	/	1973	907	1981	2805
1966	/	1974	873	1982	190
1967	193	1975	1867	1983	256
1968	1238	1976	4059	1984	/
1969	730	1977	7552	1985	551
1970	67	1978	3131	1986	4831
1971	383	1979	8	1987	36310

注:1983、1985 年为万美元

二、染、颜料和中间体

四川各地原来盛产土靛,不仅足以自给,还有输往省外。1902 年国外染、颜料输入四川,当年输入量为 182

担,金额 1913 关两。1913 年增长至 3386 担,金额 100155 关两。进口品种繁多,主要有人造靛、阿尼林、苏木膏、铜金粉、薯蓣、炭精、红丹、铅粉、黄丹、氧化钴、漆绿等 20 余种,其中人造靛

进口量最多。由于进口染、颜料色泽好,耐洗,使用和运输、存放都很方便,染坊乐于使用,销量逐步扩大。进口国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德国所垄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产品曾一度中断,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瑞士等国的产品便乘机而入。1916年进口量增至8886担,价值61045关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染、颜料卷土重来,销售量仍居各国之首。1925年进口量突破万担达10082担,金额708168关两。1929年进口量高达22918担,金额1727151关两。1928~1931年是进口最盛的时期,4年累计进口71531担,年均进口17883担。进口国别及其进口量比重是:德国约占50%,英国和美国各约占15%,法国、日本、瑞士共约占20%。各国洋行在重庆设总经销,在省内各主要城市设分销处,集镇设小分销店,相互倾销。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染、颜料进口曾一度中断。后从西南国际公路和国际航空线输入少量的染、颜料。抗日战争胜利后,染、颜料进口量有一段短暂时间的回升。

1959~1962年累计进口额仅9.1万美元,年均为2.28万美元,进口国别是瑞士、原联邦德国、英国和香港地区。1963年中断进口。1967年恢复进口,当年进口额为10.41万美元。1968年又急剧下降至0.2万美元,1970~1971年又中断进口,1972年再度恢复

进口,当年进口额为3.55万美元。嗣后进口额虽然仍有起伏,但已形上升趋势,1979年达42.52万美元。1986年又下降至11.3万美元,1987年上升至16.6万美元。

三、化学肥料和农药

(一)化学肥料

化肥是中国进口的一项主要化工产品。自50年代初起,为了满足国内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开始由国家计委统筹安排进口,分配给各省(市)、自治区使用。当时只有尿素一个品种,主要是从香港转口的日本货。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开辟了从日本和西欧国家直接进口的渠道。截至1987年,中国进口各种化学肥料约2亿吨(标准吨)。进口的化肥约占全国化肥消费量的1/5。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进口品种除氮肥、磷肥和钾肥外,复合肥料的进口量也逐年增加。

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50年代,四川农用化肥是由国家统一进口和分配的。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增加化肥供应,1959年,四川以地方外汇进口化肥5700吨,金额246.4万美元。进入60年代以后,四川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利用有了较大的发展,1976年,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和四川化工厂先后建成投产,四川成为化肥生产量较多的省份,即未再用地方外汇进口化肥。

但国家统一进口的仍有一部分分配给四川,用于兑现外贸出口商品收购奖售政策和供给外贸扶持出口商品生产。

(二) 农药

农药也是中国长期进口的商品。四川从1965年开始使用地方外汇进口农药,当年进口270吨,金额40.98万美元。进口国别,主要是原联邦德国,占84%,其次是日本,占16%。1966~1970年,累计进口1441吨,金额260.8万美元,年均进口量为288吨,比1965年增长6.6%。1971~1975年,进口量有所增加,累计1898吨,年均进口量为378.6吨,比“三五”计划时期年均增长31.5%。1976~1980年,进口量又有上升,累计3004吨,年均进口量为600.8吨;其中1980年达920吨,创历史的最高峰。

比“四五”计划时期年均量增长58.3%。随着国内农药工业的发展,70年代中国开始有少量农药出口,到80年代就有较大量的出口。而进口量则逐年减少。1982年,化学工业部颁发“进口农药审核暂行办法”。1981~1987年,累计进口761吨,年均进口量为108.7吨,比“五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量减少82%。其中1984~1986年中断了进口。1987年进口0.8吨,金额为5.4万美元。

1965~1987年,累计进口7374吨,金额1327.67万美元。主要品种有1605乳剂、乙基、24 铈钠、五氧吩嗪、杀虫脒乳剂、凯摩、甲基1605原油、稻丰散原油、苯胺、甲基托布津等。进口国别有原联邦德国、日本、瑞士、美国、意大利、罗马尼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四川农药进口表

表3-4

(1965~1987年)

单位:吨

年度	进口量	年度	进口量	年度	进口量
1965	270	1973	253	1981	283
1966	/	1974	328	1982	100
1967	650	1975	633	1983	377
1968	210	1976	343	1984	/
1969	580	1977	325	1985	/
1970	1	1978	1257	1986	/
1971	104	1979	159	1987	1
1972	580	1980	920	/	/

四、橡胶

橡胶也是中国长期进口的一个商品。1928年已有橡胶制品输入。主要品种是胶皮平片、汽车和自行车的内、外胎。新中国成立后,四川从1959年开始进口橡胶。1959~1962年,累计进口天然橡胶1455吨,金额为102万美元,年均进口量为363.8吨。1963~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橡胶无进口。1966~1975年,时进时不进,累计进口1009吨,金额44.14万美元。1976~1980年进口量逐年增长,累计进口4289吨,年均进口量857.5吨。其中

1979年进口量达1639吨。1981年无进口。1982年恢复进口,用汇额为6.8万美元,1983年又上升至980吨,用汇103.8万美元。1984年再次中断进口,1985年又恢复进口,1987年进口达3571吨,用汇金额341.4万美元。

1959~1987年间,累计进口12169吨,其中90%以上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数量极少。天然橡胶主要是从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口;合成橡胶一部分从香港地区转口,一部分从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直接进口。进口的橡胶主要是用于制造汽车轮胎。

四川橡胶进口表

表 3-5

(1959~1987年)

单位:吨

年 度	进 口 量	年 度	进 口 量	年 度	进 口 量
1959~1962	1455	1971	300	1980	680
1963	/	1972	200	1981	/
1964	/	1973	/	1982	55
1965	/	1974	/	1983	980
1966	229	1975	180	1984	/
1967	100	1976	300	1985	800
1968	/	1977	835	1986	10
1969	/	1978	835	1987	3571
1970	/	1979	1639	/	/

第三节 医药保健品

四川进口的医药保健品主要有南药(动植物药材)、西药和医疗器械三大类。

一、南药

中药(含中药材、中成药和药酒)是四川传统的出口商品,在出口中药的同时,也进口一些省内缺少的动植物药材。由于这些药材主产于高温、湿热的南亚地带,故通称为南药。1891年进口额为18784关两。嗣后,进口量逐年上升,1892~1911年累计进口额为377.4万关两,年均进口额增至18.87万关两。1912年,进口额下降至27.5万关两。1913年开始回升,而且逐年增长,1919年达到60万关两,1920年回跌至22.1万关两。1921年又回升至50.2万关两。嗣后,1922~1935年年均进口额为47万关两,起伏很小。抗日战争时期,南药进口额下降较大,1937~1939年年均进口额降至7.67万关两。1940年仅6.5关两。

1952年即恢复南药进口,当年进口砂仁、白叩、伏毛、槟榔、乳香、没药等3000担。1959~1962年累计进口额为2.71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为0.68万美元。1966年进口额上升至7.28万美元,1967年开始下跌,1968

年下跌至0.13万美元,1969~1970年中断进口。1971年恢复进口,进口额为2.88万美元,嗣后逐年上升,1975年达到21万美元。1976年又回落至9.6万美元。1977年又回升至22.86万美元。1984年上升至56.2万美元,嗣后又下跌,1987年进口额为17.3万美元。

从1959~1987年,南药累计进口额302.9万美元,其中1981~1987年为239万美元,占78.9%。进口品种有槟榔、乳香、没药、蛤蚧、西红花、海马、沉香、牛黄、砂仁、白叩、伏毛、石决明、犀角、羚羊角等30多种。进口国别主要是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南药进口额不大,但对促进四川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有积极的作用。

二、西药

西药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输入四川的。由于它服用方便,显效快等优点,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在旧中国,四川所需要的西药主要是依赖进口和省外输入。抗日战争时期,交通困难,进口量减少,市场供应靠上海、天津迁入的药厂和四川当地兴建的药厂生产。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药大量涌入,四川药厂纷纷倒闭

或改营药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制药工业极为重视和大力支持,四川制药工业稳步发展。但仍进口一些省内短缺的西药和西药原料。1959~1962年累计进口金额36.2万美元,年均进口额9.05万美元。1963~1965年,四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西药进口减少,累计进口额为13.8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为4.6万美元,1966~1970年,累计进口51.6万美元,年均进口为10.32万美元,比调整时期年均进口额增长1.24倍。其中1969年为最高点,进口额首次突破20万美元达到27.47万美元。1971年下降为3.34万美元,1972年后逐年上升,1975年回升至23.52万美元,1971~1975年累计进口50.5万美元,年均进口10.1万美元,与“三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额大体相等。1976~1980年期间,进口量起伏较大,1976年仅9.53万美元,1980年则首次突破60万美元关,达64.14万美元。五年累计进口额108.9万美元,年均进口21.78万美元,又比“四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额增长1倍。1981~1985年期间进口量继续上升,累计进口额为509万美元,年均进口为101.88万美元,又比“五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额增长3.6倍,其中1985年最高达241万美元。1986年西药进口额继续上升,1987年达714万美元。

1959~1987年期间,累计进口额

1701.5万美元,其中1981~1987年为1513万美元,占88.9%。进口的西药品种主要有原料药、西成药、医药中间体和特药。进口国别主要是西欧各国和香港地区。四川在进口西药的同时,也逐步扩大西药的出口。1955年首次向原苏联出口葡萄糖。1978年西药出口品种达30个,金额达3040万美元,为当年进口额的4.25倍。

三、医疗器械

在旧中国,四川使用的西医医疗器械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或省外输入。

1959~1965年期间,四川医疗器械的进口主要来自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品种主要是X光机、显微镜、牙科设备及器材、眼科诊断设备、X光胶片等。进口金额累计为11.7万卢布。同时也从英国、法国、瑞士、瑞典、荷兰、原联邦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和香港地区进口一些医疗器械,进口额累计为63万美元。其中1959~1962年为36万美元。1966年后,四川医疗器械全部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中断了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口。从进口一般的普通医疗器械转向进口先进的医疗诊断器械。1966~1970年期间,进口额有所下降,累计进口额为7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仅1.4万美元,其中1966年最多,达3万美元,1968年最少,仅0.1万美元。1971年后,四川医疗器械进口不断增加。1973年,从

日本进口 B 型超声波诊断仪和内窥镜各一套。1971~1975 年期间累计进口额为 48.9 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为 9.8 万美元,为“三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额的 7 倍。其中 1975 年进口额达到 35 万美元,1976~1980 年期间,进口额继续上升,累计进口额为 218 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为 43.6 万美元,为“四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额的 4.4 倍。其中从日本进口 B 超机 5.57 万美元,内窥镜 10.39 万美元。进入 80 年代,中国生产的纤维内窥镜、B 型超声波诊断仪、人工透析器等有较高水平的产品也相继出口。但四川医疗器械的进口额仍然继续上升。1982 年上升至 89 万美元。1983 年 8 月至 9 月 3 日,在成都举办了国际和港澳地区医疗器械、仪器仪表技术交流会。美、英、日、原联邦德国及港澳地区 40 余家制造厂和 19 家贸易团体参加。展品 150 台/件,价值 150 万美元。四川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领导和有关省级厅(局)负责人及 2.5 万技术人员先后到会观摩,会上成交额 248 万美元,购买展品 9 万美元。1984 年 11 月,日本国际贸易协会日本海支局在成都举办医疗器械技术交流会,展品价值 21 万美元。组织技术交流、学术报告 5 次,听众 400 余人,观众 2000 多人,会上成交 7 万美元,展品留购 50%。1983 年从原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进口 CT 诊断仪 1 台,1984 年底到货,

1985 年在省人民医院安装调试成功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四川省内第一台 CT 诊断仪,解决了过去四川对一些疑难重病得不到确诊,病员要跑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医院求诊的问题。从 1985 年 5 月投入使用后至 1987 年底,共诊断了 8547 例疑难病员。1981~1985 年期间,累计进口额为 1419 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为 283.8 万美元,为“五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额的 6.5 倍。其中 1984 年最高,进口用汇额达 695 万美元,创历史最高峰。1985 年进口额开始下降,1987 年下降至 249 万美元。

为了搞好进口医疗器械的维修,提高进口设备的使用效能,1987 年四川省外贸进口公司、四川医学院(今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美国贝克曼仪器公司在成都设立“贝克曼医疗化验仪器维修站”。具体业务由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贝克曼仪器公司支付有关费用和服务费。同年,四川省外贸进口公司、四川省人民医院与美国康宁公司在成都设立“康宁医疗仪器维修部”。具体业务由四川省人民医院承办,康宁公司支付有关费用和服务费。分别为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和西藏自治区内的贝克曼医疗仪器用户、四川省内的康宁医疗仪器用户提供安装、调试和保修期内的维修服务,并以寄售方式向用户销售维修用的零配件。

四川医疗器械、西药、南药进口表

表 3-6

1963~1987 年

单位:万美元

年度	医疗器械	年度	医疗器械	年度	医疗器械	西药	南药
1963	15	1972	/	1981	68	23	21
1964	3	1973	7	1982	85	46	37
1965	9	1974	7	1983	331	65	49
1966	3	1975	35	1984	695	134	56
1967	3	1976	42	1985	240	241	36
1968	/	1977	30	1986	191	290	23
1969	/	1978	44	1987	249	714	17
1970	1	1979	24	/	/	/	/
1971	/	1980	78	/	/	/	/

注:1981 年以前缺西药、南药进口额的统计资料

第四章 纺织产品及其原料

四川进口的纺织品包括纱、布、呢绒等(不包括丝绸,下同);进口的纺织品原料包括棉花、人造丝和合成纤丝等。在旧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洋纱、洋布”充斥省内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纺织工业迅速发展,不仅逐步

解决众多人口的穿衣问题,而且开始有了出口。50年代初期有毛织品的出口,50年代后期有少量的针棉织品出口,1979年开始出口棉纱、棉布,到1987年四川纺织品出口额累计达3.15亿美元。

第一节 棉织品

一、棉 纱

近代以来,棉纱是四川进口的大宗商品。1858年,汉口开辟为通商口岸后,洋纱便开始输入四川,嗣后逐年增长,1889年四川棉纱进口量达6700担。由于洋纱、洋布进口,按照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只纳5%的海关税(实际上不到5%);内销也只在进口的地方,一次缴纳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

中国商人贩运的洋纱、洋布,也同样享受子口税的待遇。至于土纱、土布则滥行征税。洋纱、洋布的价格比土纱、土布还低。因此,洋纱便似潮水般地涌入四川各地。纺纱原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家庭主要副业,洋纱的涌入,土纱便逐步被排挤淘汰。1891年洋纱输入数量增长到28183担,1903年又增长至455331担,进口量比1891年增长了15倍,1904年虽有所下降,而1914年

又上升到 460200 担。

重庆开埠后,输入四川的棉纱主要是英国、英属印度、日本的棉纱。进口棉纱在市场销售方式上大体有三:一是洋行直接运货到四川市场销售;二是洋行雇佣买办推销;三是四川商人到上海、汉口向洋行进货,再批发给各地纱号、分庄和零售商贩。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等沿海地区民族资本的棉纺织业兴起。输入量从 1914 年后有所下降,1918 年最低为 249046 担,比 1914 年减少了 46%。1919 年开始回升,1922 年突破 50 万担达到 506329 担。1925 年增至 512983 担。1925~1935 年的 10 年期间在 40~50 万担上下起伏,年均为 48.7 万担。其中:1930 年最高达 576692 担。

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江航运受阻,棉纱输入量锐减。1941 年剧降至 1.76 万担,1942 年回升至 3.04 万担。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再无棉纱进口。

二、棉 布

鸦片战争前,四川农村“男耕女织”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基本部分。所产土布,除满足省内需求外,还远销贵州、云南等地。1858 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洋布便开始渗入重庆。1876 年,宜昌辟为通商口岸后,输入汉口的棉织品有三分之一以上销入四川。1891

年,从重庆海关输入之棉布为 15.36 万匹,金额 40.76 万关两。1892 年增长至 78.3 万匹,1 年时间增长了 4 倍,金额 188.45 万关两,占全省进口总值的 32%。洋布享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和优惠,价格低廉;而土布却遭苛捐杂税之苦,价格高昂,更无法与洋布竞争,市场逐步为洋布占领,洋布进口不断增加。1900 年洋布进口增至 272 万关两,1908 年继续增长至 423 万关两。当时仅重庆一地经营洋布的商店多达 90 家。在 1912 年以前,英国棉布称霸四川棉布市场。

民国初期,洋布进口量有所减少,1913 年进口额下降至 336 万关两,比 1908 年减少了 2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四川洋布进口额继续下降。1914~1918 年累计进口额为 1220 万关两,年均进口额 244 万关两。其中 1918 年最低仅 163 万关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四川洋布进口额又迅速回升,1919 年达 359 万关两,1929 年继续增长至 784 万关两,这一时期,日本棉布取代了英国棉布在四川棉布市场的霸主地位,日本棉布约占进口量的 70%,英国棉布不到 30%,此外,荷兰、印度、土耳其、意大利、美国等也有少量的棉布进入四川。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四川人民掀起了几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1930 年后,洋布进口量开始下降。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四川人民

抵制日货,日本棉布采用“走私”方法输入四川,而且“走私”货的价格仅为土布价格的五分之一。1932年日本“走私”棉布约1.7万担,1933年则上升为2万余担。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江中下游交通堵塞,继之西南国际公路运输又中断,四川棉布进口几乎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棉布大量输入四川,并取代了日本、英国而独霸四川

棉布市场。美国还采用“赠送罗斯福布”等形式倾销美国棉布。国民政府又以美国棉布抵换川粮,1946年,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每月运入四川的美国棉布约3万匹。四川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纺织厂无法与之竞争,纷纷倒闭。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不再进口棉布。

第二节 毛织品

抗日战争前,四川是出口羊毛、进口呢绒的省份。1891年,呢绒进口16574匹,金额为17.79万关两。1892年增长为56607匹,金额为49.24万关两。1年进口数量增长2.4倍。嗣后有起伏,1900年增长至50.89万关两。后有所下降,1901~1916年年均进口额为15万关两。嗣后继续下降,1917~1923年年均进口额下降至4.28万关两。1924年又开始回升,1924~1931年年均进口额上升至39.39万关两。进口的呢绒品种繁多,有羽纱哔叽、单面斜纹呢、直贡呢、薄

花呢、细法兰绒、法兰呢、细呢、大衣呢、花呢、小呢、旗纱布、羽绫等10多个品种。

1932年呢绒进口量开始锐减,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于中断。同时,四川羊毛输出也因交通堵塞而中断。四川始建川康、民治毛纺厂。抗战胜利后,美国呢绒又大量涌入四川,并取代了日本、英国,而独霸四川呢绒市场。四川新建的川康、民治毛纺厂则受到排挤而被迫停产。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中断了呢绒的进口。

第三节 纺织原料

旧中国时期,四川纺织品进口以洋纱、洋布、呢绒等为主,出口以羊毛

为主,而且都是四川进出口的大宗商品。纺织品原料没有进口。这种进出

口商品结构完全适应帝国主义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纺织品进出口商品结构立即起了变化。棉纱、棉布、呢绒等纺织品由进口转为出口;羊毛由出口转为进口,还增加了棉花、涤纶丝等纺织原料进口。逐步形成进口原料、出口制成品的格局。

50年代初期,中国在纺织品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为了适应纺织工业发展和扩大出口的需要,还大量进口纺织原料。主要品种有棉花、羊毛、涤纶和腈纶等。四川使用地方外汇进口纺织原料较晚,始于1974年。1974~1977年累计进口人造丝153吨,金额24.82万美元。1979年,四川省纺织品进出口分公司经总公司批准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当年由上海口岸公司进口棉花调供四川加工成棉纱、棉布调供上海口岸公司出口,当年棉花进口未列入四川统计。嗣后,“以进养出”业务不断扩大,并由四川自己办理纺织

原料的进口。1980年进口1185万美元,为1974~1977年累计金额的47倍。1981~1987年累计进口额为3655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为522万美元。其中1987年剧增达1450万美元,创历史最高峰。进口品种主要有人造丝、锦纶丝、涤纶、化纤、合成纤维、羊毛、腈纶膨体纱等。进口国别和地区主要是香港、韩国、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

纺织品原料进口贸易的发展,不仅对促进四川纺织工业生产的发展、补充和活跃国内市场、改善人民生活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以进口原料加工半成品和成品出口,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据对外经济贸易部以1979年为例,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出口的创汇率已达到1:2.14,即进口1美元的原料经过加工成成品出口可收汇2.14美元。同时,在国产原料不足的情况下,进料加工还可使工厂维持生产,工人得到就业,并增加财政收入。

四川纺织原料进口表

表3-7

1981~1987年

单位:万美元

年 度	纺织原料	年 度	纺织原料
1981	729	1985	74
1982	206	1986	697
1983	14	1987	1450
1984	485		

注:本表不包括进口纺织物成品

第五章 轻工产品和粮油食品

第一节 轻工产品

在旧中国时期,进口的轻工产品品种繁多。1892年,纸烟进口额为977关两。嗣后逐年上升,1926年,进口额达92.82万关两。当年发生万县“九·五”惨案^①,四川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抵制英货。1927年纸烟进口额曾一度下降,但1928年又开始回升,1931年进口额达290.8万关两。此外还有各种日用百货——纸张、照相机、自行车、缝纫机、钟表、香水脂粉等。各种“洋货”充斥市场,严重打击了民族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轻工业品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产品数量和花色品种不断增加,质量日益提高。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在50年代初期即开始出

口。四川在出口的同时,还进一些省内短缺的纸浆、纸张等轻工业原料和手表、家用电器等轻工业品,以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对“洋火”、“洋烟”、香水脂粉等消费品则停止进口。1959年四川省开始使用地方外汇进口轻工产品,当年进口纸张和文体用品。金额很小,外贸统计报表尚未单独统计。1966年增加了照相机、缝纫机、收录音机等品种,当年进口额仅6万美元。1967~1973年累计进口额为33万美元,年均进口额4.7万美元,其中1969年最高为10万美元。1974年进口额突破10万美元达到18万美元。1975~1978年累计进口额为76万美元,年均进口额19万美元,1979

^① 万县“九·五”惨案指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在万县制造的惨案。1926年8月29日,英商太古渝公司“万流”轮有意浪沉驻万县的川军杨森部的木船。溺死官兵58人,损失枪支弹药数千,盐款8.5万余元。杨森部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和赔偿损失。9月5日英方派来了3艘舰只开枪寻衅,毁民房、商店2000余间,死伤千余人。惨案发生后,在全国掀起了反英爱国运动。

年进口额突破 100 万美元,达 118 万美元,其中主要商品有照相电影器材 32.2 万美元,占 27.4%;纸张和复印机共 21 万美元,占 17.9%;电视机 4 万美元,占 3.3%。1980 年增长至 948 万美元。1981 年突破 1000 万美元达 1085 万美元,主要是电视机和音响设备大幅度增长,其金额达 801 万美元。占轻工进口额的 73.8%。1982 年和 1983 年,轻工产品进口额随之下降至 356 万美元和 305 万美元,比 1981 年减少了 67.2%和 71.9%。主要是由于进口电视机的“热潮”快速“退潮”。1984 年家用电器进口“热潮”再次卷来,轻工产品进口额回升。1985 年进口额达 2831 万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 17420 万美元的 16.3%。其中主要商品电视机及音响设备 759 万美元,占 26.8%;家用电器(含冰箱)1205 万美元,占 42.6%;照相器材 443 万美元,占 15.6%。1986 年后稍有下降。1987 年又增长至 7325 万美元,比 1985 年增加 158%,占当年进口总额 26086 万美元的 28%。比 1985 年增加了 12 个百分点。其中主要品种有:电视机及音响设备 4569 万美元,占 62.4%;家用电器(含冰箱)1202 万美元,占 16.4%;照相器材 1016 万美元,占 13.9%。

一、纸 张

1891 年纸张进口量为 99 担,嗣

后陆续增长,1908 年为 1787 担。民国初期,纸张进口量继续增长,1912~1920 年期间,年均进口量为 4727 担,比 1908 年增长 1.6 倍。1921~1923 年期间,年均进口量增长至 7139 担,1924~1931 年期间,年均进口量继续增长为 15039 担。四川进口的纸张多来自日本。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1932 年后,纸张进口量开始下降,1932~1936 年期间,年均进口量下降至 3763 担,比 1924~1931 年年均进口量减少了 75%。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纸张进口量急剧下降而濒于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纸张进口又曾一度回升,1946 年进口额为 11920 万元法币。

新中国成立后,纸张既是四川轻工业品出口的一项大宗商品,同时也进口一些省内短缺的品种。1959~1961 年累计进口额为 1.69 万卢布和 0.34 万美元,其中从原民主德国进口绝缘纸板 11 吨,从英国进口红色罗柱纸金额 0.12 万美元和压版纸 0.14 万美元,从香港进口压板纸 0.08 万美元。1962 年,纸张中断了进口。1979 年恢复纸张进口,1979~1982 年累计进口额为 59.5 万美元,年均进口额 14.9 万美元,其中,1981 年进口额最高为 26.9 万美元。1984 年从香港进口玻璃纸 5 吨,金额 1.05 万美元。1987 年,由于印刷工业纸张用量增大,特别对铜板纸需求量增幅大,当年

进口各种纸张达 850 吨,金额 95.6 万美元。

1981~1987 年累计进口各种纸张 1778 吨,用汇金额达 274 万美元。进口的主要是新闻纸、铜版纸、白报纸、牛皮卡纸和玻璃纸等。进口国别和地区主要是香港地区和日本、美国、英国、奥地利、原民主德国等国家。

二、纸 浆

纸浆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进口的主要轻工原料之一,除由外贸专业总公司给四川进口的“以进养出”的纸浆外,1981~1987 年间,地方共进口四次,累计为 2934 吨,金额 139 万美元。第一次在 1983 年,从香港进口漂白木浆 192 吨,用汇金额 4 万美元;第二次在 1985 年,从香港进口漂白木浆 391 吨,用汇金额 14.8 万美元;第三次在 1986 年,从加拿大进口机制木浆 500 吨,用汇 20.2 万美元;第四次在 1987 年,进口漂白长纤维亚硫酸盐浆和其它纸浆共 1851 吨,用汇金额 100 万美元。其中从日本进口 1011 吨,用汇金额 62 万美元,从香港地区进口 840 吨,用汇金额 38 万美元。

三、照相电影器材

早在 1898 年就已有照相电影器材输入四川,当年进口额为 1939 关两。嗣后持续有所增长,1901~1903 年年均进口额增至 4706 关两,1905~

1911 年年均进口额增至 6870 关两。民国时期,1912~1914 年年均进口额激增至 10999 关两。1924~1931 年年均进口额又增至 34351 关两。1932 年进口额急剧下降,1932~1935 年年均进口额下降至 1315 关两。抗日战争初期又有回升,1937~1939 年年均进口额为 6828 关两。1940~1949 年未见有进口记载。

1966 年恢复进口照相电影器材,6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进口额都很小。1966~1976 年累计进口照相机 83 台,其中 1973 年最高为 28 台。1977 年后进口增幅较大,当年进口额 9.2 万美元。嗣后继续上升,1979~1982 年累计进口额为 133.7 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为 33.4 万美元,又比 1977 年增长 2.6 倍。1983 年急剧上升至 162 万美元,1984 年后继续上升,1985 年达 443.2 万美元。1986 年下降至 181 万美元,比 1984 年的 241 万美元减少了 35%。1987 年又激升至 1016 万美元,为当年进口总额 26086 万美元的 3.9%。

进口国别和地区主要是香港、日本、美国、原联邦德国等。

四、电视机及其零件

电视机生产在四川是一个新兴工业部门,自 70 年代后期以来,在引进上发展很快。产量日益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在 80 年代中期,除供应国内

市场外,还有少量的出口。

四川电视机进口始于1971年,当年只进口1台。1971~1977年期间,每年进口额都不大,累计进口24台,用汇金额1.93万美元。1978年,中断进口。1979年恢复进口,当年进口24台。1980年电视机和零件的进口额急剧上升达395.3万美元。其中电视机32079台,电视机零件153.8万元。此外还引进部分专利技术和关键设备。为了做好进口电视机散件在省内组装的工作,在1979年10月,先后邀请日本胜利公司(JVC)及其商务代理岩井株式会社、松下电器株式会社及其商务代理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来四川进行技术交流和商务谈判。商务工作由四川省外贸进口公司办理。四川省外贸进口公司分别与岩井株式会社和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签订了如下合同和协议:

1. 成都无线电一厂进口胜利公司14英寸彩色电视机散件5000套,金额94.59万美元(1英寸=2.54厘米);
2. 重庆无线电三厂进口松下12英寸黑白电视机散件10000套,金额56.89万美元;
3. 长虹机器厂进口松下14英寸彩色电视机散件2000套,金额37.84万美元;
4. 旭光仪器厂进口松下收录机散件10000套,金额29.98万美元。

在进口电视机散件的同时还引进了部分专利技术和关键设备。日商为打开四川市场,除成交价格给予优惠外,还无偿提供组装电视机用的工、夹具;自费派遣技术人员来四川工厂进行现场技术指导;接受四川工厂的技术人员在日本有关工厂进行技术培训。四川工厂组装的电视机、收录机质量达到日本原工厂同类产品的水平,双方同意使用日本原厂方的牌号和商标。

成都无线电一厂、重庆无线电三厂、长虹机器厂、旭光仪器厂在组装进口电视机散件过程中,经过消化创新,提高了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扩大了生产规模。成都无线电一厂、重庆无线电三厂由原来的年产量1~2万台扩大到10~15万台的水平。由原来的手工焊接、手工插件、人工传递改为自动波峰焊接、自动化传递、集中信号源、合理工位布置和科学管理,由电子管、晶体管线路过渡到集成电路,采用塑压机壳,造型美观大方。产品质量MTBF由1000小时以下提高到5000小时左右。成本下降,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经济效益显著。1981年继续进口电视机散件、关键件和一些设备仪器。进口用汇金额(含电视机)为645.4万美元。1982年和1983年电视机和其散件,关键件的进口大幅度下降,年均进口额仅19.35万美元。但在1983年电视机国产化水平达到80%

以上,产品质量 MTBF 提高到 15000 小时以上。

1984 年,为了搞活省内市场,搞活外贸,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厅进口彩色电视机 15829 台,用汇金额 296.7 万美元,电视机关键件,进口用汇金额 140.8 万美元,其中显像管 11430 只,用汇金额 15.3 万美元。1985 年进口额达 590.9 万美元,其中彩色电视机 14229 台,用汇金额 264.6 万美元;电视机零件 214.7 万美元;显像管 85560 只,金额 111.6 万美元。其中首次从香港进口台湾产品——黑白电视机显像管 70320 只,金额 91.1 万美元,享受国家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税优惠。1986 年进口额又急剧上升到 781.7 万美元。1987 年继续上升至 3361.5 万美元,比 1986 年增长 3.3 倍,占当年轻工产品进口总额 7325 万美元的 45.8%。

进口国别和地区,主要是日本、原联邦德国等国家,有少量从台湾省进口。

五、收录音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 (不含电视机,下同)

家用电器最早输入四川的产品是收音机、录音机和磁带。1966 年四川进口收录音机用汇金额 1.9 万美元。嗣后每年都有少量进口,1966~1970

年,累计进口用汇金额为 10.65 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仅 2.13 万美元。1971 年后进口额有所下降,1971~1975 年累计进口用汇金额 3.67 万美元。年均进口额仅 0.73 万美元。比“三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额下降 71%。1976~1980 年期间进口额起伏较大,累计进口额 121.76 万美元,年均进口额 24.35 万美元。其中 1977 年最少,仅 410 美元,1980 年最多,为 115.41 万美元,占累计数的 94.35%。1979 年开始进口一些家用小电器,当年仅 0.43 万美元,1980 年上升至 4.57 万美元,主要是电饭煲、刮胡刀、电吹风、电风扇等。1981 年后进口额增幅较大,品种也有所增加。1981~1985 年期间累计进口额 1461 万美元。年均进口额 292.2 万美元。比“五五”计划时期年均进口额增长 11 倍。增长因素主要是在 1982 年开始电冰箱、洗衣机的进口量逐年增长。当年洗衣机及其零件进口金额 39 万美元。电冰箱进口金额 0.9 万美元。1985 年,电冰箱及其零件进口金额达 942.6 万美元,洗衣机及其零件 112.7 万美元。1986 年后继续增长,1987 年进口额达 1202 万美元。

进口国别主要是日本,其次是香港地区和意大利、原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和瑞士等国家。

四川轻工部分商品进口表

表 3-8

(1981~1987 年)

年 度	纸张(吨)	纸浆(吨)	照相器材 (万美元)	电视及音响 (万美元)	家用电器 (万美元)
1981	117	/	45	801	6
1982	197	/	37	121	52
1983	/	192	162	87	15
1984	114	/	241	524	183
1985	/	391	443	759	1205
1986	500	500	181	828	615
1987	850	1851	1016	4569	1202

注:家用电器不包括收录机等音响设备金额

第二节 粮油食品

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就有供少数人享用的粮油食品输入四川。品种有洋酒、罐头、鱼介海产品、干鲜果品、奶油、奶粉、糖果、咖啡、香料、大米、面粉等。金额不大,但品种繁多。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停止了为少数人享用的洋食品进口,开始了为发展农业、畜牧业的种籽、种畜以及工业生产原料的进口。1966年引进瑞典LANDRACE种猪100头,分配给重庆市种畜场和荣昌畜牧学校。后又陆续从瑞典、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引进良种猪30头,良种羊110头,良种牛9头。从1962年到1980年

进口牛羊油14540吨。1986~1987年进口棕榈油6887吨,金额241.3万美元。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配合旅游业的发展,四川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分公司于1985年开始经营寄售外国烟、酒、饮料和小食品的业务。当年度在成都饭店、锦江宾馆、重庆人民宾馆试销,以后继续发展,至1987年,寄售单位发展到27个,销售额28.1万美元,比1985年销售额10.96万美元增长1.5倍,比1986年销售额13.16万美元增长1.1倍。主要品种是洋酒和饮料,其金额达27.1万美元。